

流动的音乐思维 先秦诸子音乐论新探

[韩]朴素晶◎著

这部书主要从音乐思维的角度探索先秦诸子的多元文化。儒道都有自己的音乐观，有丰富的表达，但如果不懂音乐，就无法研究，因此，先秦音乐虽然是个重要的领域，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深度的研究。朴素晶教授对古汉语、古代思想文化以及古代音乐都有很深的造诣，因此，她具有研究先秦音乐的特殊才能，能够得出扎实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可以对先秦思想的研究产生实质性的促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流动的音乐思维

先秦诸子音乐论新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动的音乐思维：先秦诸子音乐论新探/(韩)朴素晶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
(国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0-22261-5

I. ①流… II. ①朴… III. ①音乐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J6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5564 号

国学研究文库

流动的音乐思维

——先秦诸子音乐论新探

[韩] 朴素晶 著

Liudong de Yinyue Siwe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7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12 000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任：

冯其庸 纪宝成

顾问：

季羡林 饶宗颐 何兹全 任继愈 叶嘉莹 庞朴 傅璇琮

李学勤 方立天 张立文 张岂之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子今 王炳华 乌云毕力格 厉 声 叶君远 向世陵

牟钟鉴 孙家洲 杨庆中 李均明 李 零 宋志明 沈卫荣

孟宪实 赵平安 姜日天 袁济喜 徐 飞 诸葛忆兵 黄朴民

黄克剑 常伯工 梁 涛 韩兆琦 彭永捷 葛兆光 傅 谨

总序

冯其庸

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它应该是包罗宏富的。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诸子学，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学，以左迁为代表的史学，以韩柳欧苏为代表的文章学，以《诗经》、乐府、李杜韩白苏辛周姜为代表的诗词学，以周程张朱为代表的理学，以关王白马高孔洪为代表的曲学，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为代表的小说学，还有其余相关的如古文字、音韵、训诂学、目录版本学等诸种学问，应该是国学的主要内涵。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国家，我们不能把国学局限于某一局部，这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国学也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在不断丰富发展，唐代的国学总比秦汉要丰富，后代往往胜过前代，国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也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深化、有所革新，国学的典籍、文献资料也有所扩展增添。近百年来，大量甲骨文的发现，青铜铭文的发现，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古籍的发现，敦煌宝藏大量经卷典籍的发现，西部大量古文书简的发现，不是使我们的国学、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容都大大地丰富了吗？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吗？所以，国学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意志的共同载体，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被战胜的强大自信力量的源泉。

从内容上看，国学与传统文化部分内容是重叠的，但国学并不能完全等于传统文化研究。西方文化进入以前，中国已经有两千以上的学术文化传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在西方文化大举袭来的情况下，近代中国产生了“国学”的观念，来应对西方文化进入后的文化格局，作为一个与西学、现代学科相区别的一个分类，来指称中国传统的学术。而“中国

“传统文化”的观念，其范围就广得多，既包括学术的形态，也包括非学术的形态。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要比国学的内涵大，国学是一种特殊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从研究的态度上看，国学的特殊性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意识。搞国学的人之所以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个人的生计、名利，也不是为了某种具体的功利，而是要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古代先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济世安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学宗旨，应该首先得到继承和弘扬。在研究方法上，国学研究不排斥学习、借鉴、引进外来的研究方法，但更强调对传统研究方法合理因素的吸收和继承，或者说，它是在传统的训诂、考据、义理、词章方法基础上，去吸收、融合西方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学不仅是在现代西学冲击下对固有知识体系的一个简称，同时也因为这个固有的知识体系里面它有一些内在的脉络，一些固有的体系结构，而对此是不可以用西方文史哲的研究方法来简单处理的。相反，只有既立足于中国学术传统，又具有现代学术意识，才有可能在国学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自2005年创办起，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既是鼓励也是鞭策，要求我们必须更好地工作，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希望。近三年来，我们循序渐进，择要取精，在教学、科研上对国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我们不提倡对“什么是国学”作定义式的讨论，甚至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论之中，而是鼓励我们的老师在教学、科研中去摸索国学的基本内涵，搞清国学自身的规律及特点。读者看到的这套“国学研究文库”，便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部分老师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收入了一定数量来自社会的稿件，每部稿件都经过专家的严格审定，达到了该领域的较高水平。本文库将每年推出几部，希望能持之以恒，积少成多，对方兴未艾的国学事业添砖加瓦、推波助澜。

2008年4月3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先秦诸子音乐话语的争论焦点：古乐与新乐、艺术与道德	4
一、前言	4
二、古今音乐之对立	5
三、作为艺术的音乐与作为道德手段的音乐	12
四、结语	18
第二章 道家乐论的萌芽：《老子》的“音·声”关系	20
一、前言	20
二、道家乐论研究的现状分析	21
三、对《老子》“音·声”概念理解现状	23
四、对老子“音·声”概念的完整理解：艺术和哲学之间	29
五、结语	35
第三章 集儒家音乐论的大成：《乐记》的思想多元性	37
一、前言	37
二、《乐记》作者与成书时期问题	38
三、诸子论乐及礼乐批判	46
四、《乐记》中的不同思想倾向	53
五、结语	63
第四章 道家音乐论的反击：《庄子》音乐思想和“咸池乐论”	64
一、前言	64
二、《咸池》作者的争议	65
三、虞舜的《九韶》和黄帝的《咸池》	69
四、《庄子》的黄帝形象与《咸池》	73
五、黄帝的《咸池》与道家音乐论的理想	77
六、结语	79

第五章 不朽的音乐思维：儒道音乐论的张力和其对东亚音乐论的影响 (以朝鲜雅乐为例)	80
一、前言	80
二、庄子乐论的主要观点	82
三、北宋音乐讨论中庄子思想的印迹：以陈旸《乐书》为主	87
四、韩国音乐讨论中庄子思想的印迹	91
五、结语	94
结 语	95
附 记	97
参考文献	99
后 记	106

过去中国音乐思想的讨论被有意无意地关注到诸子讨论的

动态性因此往往用各学派的僵化规定来得出简单结论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不但掩蔽了诸子音乐话语的真实面貌而且让人忽略在儒家思想内部的不同论点和其发展过程诸子音乐讨论的僵化导致先秦儒家所提出的多样的音乐主张也无法继续发展而只能成为在后世史幕中被反复讲述的游魂

导言

这里编缀成书的文章不是一时写成的，也不是为了特定的研究计划而写的，而是我所遇到的种种机缘会合的结果。从1997年夏天将“庄子的艺术哲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以来，我的学术路程仿佛是向未知领域的探险。我原初关注到艺术和审美经验，是因为期待着能够通过这领域的探索，从而扎实地叙述中国哲学的精髓。随着读书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音乐是中国艺术论的核心问题，于是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庄子哲学的音乐论上。1999年开题时，听到这题目的学长和同学们的第一反应是，在《庄子》里哪有称得上音乐论的内容？他们这么认为也不是没有道理，在《庄子》里涉及音乐的部分的确极少，而且其中对当时音乐的否定式表达较多，因而并不容易重建正面性的音乐思维。但我着眼于同一时代语言的共通性，将探索的范围扩大到道家、儒家以及先秦诸子文献，以把握住先秦音乐讨论的概念框架，从零散且微妙的《庄子》音乐话语中得出相当完整的思想模式，终于完成了《以乐论考察庄子之艺术哲学》一文。

一个想法的开花结实需要凑巧的机缘。如果不是我碰巧来到新加坡，《流动的音乐思维》绝不可能问世。与在韩国的时候相比，来到新加坡这一学术交流频繁的国度之后，我有了更多机会在英文及中文学界发表文章。这部书里收录的中文论文，是从2007年11月起访问了香港、上海、台湾以及北京后所陆续发表的。第一篇用中文发表的文章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会议上的《〈老子〉的“音声相和”和“大音希声”辨析》。《庄子音乐论之后世影响》是应邀参与台湾屏东教育大学主办的东亚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写成的，《先秦诸子音乐话语的当代意义》和《从先秦诸子思想的角度论〈乐记〉的不同倾向》两篇文章是先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所主办的会议上发表的。每次会议的主题并不一样，

但我在基于会议的个别要求选题时，也不期然地将其跟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尚未解决的难题连接。

虽然这部书收录的章节内容已经不是当初发表的文章的原样，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选题、写作以及与参会学者讨论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想法有了怎样的发展。得力于同道的支持和鼓励，我慢慢意识到这五篇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写成于不同场合的文章原来具有内部连接性，仿佛是反映我的学问经历的一串连环，可以说是我对中国音乐论研究的小总结。

这部书探索先秦诸子的多元创新的音乐思维。先秦思想的空前成就是诸子论辩的产物，不同思想家之间的互相批评、互相塑造，正是推动先秦学术发展的真正力量。但过去中国音乐思想的讨论没有充分地关注到诸子讨论的动态性，因此往往用各学派的僵化规定来得出简单结论，例如“先秦诸子当中只有儒家讨论音乐”或者“墨子是主张非乐的……道家也是主张非乐的……乐根本有害”等。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不但掩蔽了诸子音乐话语的真实面貌，而且让人忽略在儒家思想内部的不同论点和其发展过程。诸子音乐讨论的僵化导致先秦儒家所提出的多样的音乐主张也无法继续发展，而只能成为在后世史书中被反复转述的游魂。

先秦诸子音乐话语不限于对作为艺术一分支的音乐的讨论。众所周知，在先秦语境中的“乐”不仅具有诗、歌、舞之综合的外延和感情教育的内涵，进一步说，还有相当于现代语境中“艺术”的普遍意义。先秦时期的艺术讨论，围绕“乐”这一关键词展开，不同哲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看法。这种多元性也存在于所谓儒家群体之内。孔子并不是儒家艺术哲学的完成者，而是一个启动及开端者。从他的弟子群开始已经有种种分歧，他们对孔子的还不明确的音乐话语加以具体的诠释和适用。就连似乎全然忽略音乐的墨子也不是对音乐无知的人，事实上，他是由于比任何人更敏锐地看透了音乐的本质，才树立了对音乐的坚决的批评观。之后的讨论也以各种多彩的形态进行，就是说，先秦音乐话语不是单线性发展，而是经历了批判和反应、继承和延伸、综合和妥协的阶段，形成主干思维的动态过程。正因为先秦哲人进行了那么激烈而集中的音乐讨论，直到魏晋时期书论、画论、文论等个别艺术论开花的时候，才将先秦音乐论的审美术语和思想模式，当作个别理论的内部逻辑。虽然先秦哲人都意识到并关注过“乐”的问题，但是将它系统化而建立了互相对立且具有可持续性的理论的是后来被归入儒家或道家的哲人。因此，我将在叙述了先秦诸子讨论的

大局观之后，放置更多的重量在儒道对立的论辩部分。

第一章首先阐述先秦诸子音乐话语的争论焦点。由新音乐的广泛流行引发的思想讨论，围绕着古乐与新乐、艺术与道德的议题展开。与学界的一般理解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弟子们，例如子贡、子夏、子游等，对古今之乐持有不同的看法；墨子的礼乐批判也有促成诸子音乐讨论的理论化的一面。墨子是不分古乐和新乐而以“乐”的概念框架来谈的第一位思想家，并且他的“非乐”命题引发了孟子和荀子等对孔子音乐的不同诠释和趋向。此外，音乐的艺术性和道德性讨论也是在先秦诸子文献中广泛存在的重要议题。第二章将论述作为道家音乐论萌芽的《老子》中的“音·声”关系，包括对“大音希声”和“音声相和”的传统注释以及当代理解的局限性的讨论，从而提出对这两道命题的完整的理解，并展现出从老子到庄子再到嵇康（223—262）的道家音乐论的思想模式。在第三章中，我将详细讨论《礼记·乐记》（以下简称《乐记》）的思想多元性。通过对《荀子·乐论》、《庄子·天运》以及《吕氏春秋》等相关数据的语言分析，先梳理《乐记》的作者与成书时期的问题，之后，进一步说明作为集先秦儒家音乐论的大成的《乐记》的思想内涵及其复杂性和多元性。第四章将讨论道家音乐论的反击。《庄子·天运》的“咸池乐论”既是对《庄子·齐物论》所提出的天籁说的一种诠释，也是庄子学派对《乐记》所展现的儒家音乐论的回应。第五章将显示先秦诸子讨论并没有完全失去其生命力，而是作为隐微而不朽的音乐思维在后代东亚历史里不断地发挥作用。我会介绍在东亚世界官方文书中所体现的儒道音乐论的张力和其互动状况。在结语部分，我将总结先秦诸子音乐论的当代意义，指出其不仅具有可以与古希腊音乐论媲美的思想价值，而且蕴蓄着有助于当代音乐讨论的启发性。

在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兴趣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希望这部书能够填补部分学术空白，也盼望获得更多读者的指正和讨论。

有充分地关注到诸子讨论的

动态性因此往往用各学派的

僵化规定来得出简单结论这

种一概而论的说法不但掩蔽

了诸子音乐话语的真实面貌

而且让人忽略在儒家思想内

部的不同论点和其发展过程

秦儒家所提出的真

主张也无法继续

成为在后世史书

述的脉络

第一章

先秦诸子音乐话语的争论焦点：

古乐与新乐、艺术与道德

先秦乐学研究

一、前言

众所周知，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环节，并且奠定了东亚思想的共通基础。可是，怎么看待诸子思想这一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让我们难以着手的原因是“诸子”概念本身而不是诸子思想的多元性。汉代学者以“诸子百家”来表达先秦思想百花齐放的局面，为了把握其全貌，又提出六家或九流十家等诸子分类方式。这些分类法确乎有用，让初学者能一目了然地辨别错综复杂的诸子思想，但又因为如此，一旦到达所谓先秦诸子这一未知领域之后，如果还要继续进行思维探险的话，这类框架则应被丢弃，因其将成为探究先秦思想本来面目的一个障碍，例如，人们很容易认为儒家是以孔子为顶点的单一思想群体，道家是以老子为顶点的一种思想单位，但是属于所谓儒家的哲人并不是齐声同唱一首歌，属于所谓道家的哲人也并不是与儒家思想事事对立。把一个学派均质化的想法，让我们不能看清同一个学派内部的思想冲突与调和，在不同学派之间划上明确分界的想法也阻止我们看到它们之间的共通议题及其真实的演变过程。

为了理解先秦诸子的独特性格与当代意义，我们需要摆脱“诸子”框架来看待诸子百家思想，换言之，我们首先需要把探讨方式从学派分类转换为问题中心。说到底，先秦思想的空前成就是诸子论辩之产物，不同思想家之间的互相批评、互相塑造，正是推动先秦学术发展的真正力量。某一思想家的思想方向常常由他所批评的思想家的命题来决定。为了反驳对手的主张并且加强自己的论点，他需要磨炼自己的对应逻辑，通过这种不同论点的冲突与妥协的论辩过程，不同思想家的命题共同交织在先秦思想的质地里。我们

应该要注意他们一起参与讨论而产生激烈分歧的看法，而不是对各个学派的僵化规定。因为在这错综复杂的论题中，难以判定而产生的数不清的后续问题，才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依然保持张力的先秦思想的真正问题。

音乐话语是迫切要求进行这种思维转变的代表性论题。在周代礼乐制度崩溃、新兴音乐风靡天下的状况下，先秦时代的读书人对新音乐的反应是多样的，有强烈的批评，有开放的态度，也有各种中间地带，甚至有极端的漠视或无批判的追随。儒家音乐话语里也出现过种种分歧。与一般的假定相反，先秦时期的所谓儒家^①并不是一味反对所有的新音乐，也不是天真地认为在当时社会中能够恢复古代音乐的原形。同样，对当时音乐活动或对拥护古代音乐的趋向加以激烈批评的诸子，他们也不是简单忽略音乐本身，而是通过暴露当时议论的弱点去刺激及推动先秦音乐话语的发展。以下，我要先揭示诸子音乐辩论之主要论点，其中以古乐与新乐、艺术与道德之辩为主，依次说明围绕这些问题产生的丰富又深刻的音乐话语，最后尝试讨论先秦音乐话语的当代意义。

二、古今音乐之对立

孔子活动的时期，正处在周王室的文化权威不如从前，各诸侯国推进各自的宫廷音乐成为一种风气，新音乐开始广泛流行的时候。从春秋中期一直到战国末期，各国君主追求和享受的是各种新音乐。新音乐的文化权力远远超过周王室保存下来的音乐传统。这激发读书人反思、解释及判断。如果没有出现新音乐这个显著的社会问题，春秋时代的读书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它与先王之乐的不同，也不会发觉提倡其价值的必要性。

新音乐并不是单纯的民间流行音乐，而是威胁到传统音乐的地位并且逐渐取代其权威的一种宫廷音乐。以音乐为赏罚手段原是周天子的固有权限^②，而在春秋时代，诸侯以音乐进贡，有力的诸侯甚至像周天子那样把音乐赏赐给自己的臣下。这说明当时的读书人意识到，作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新音乐，并不是在民间自然发生而自然变化的一般歌谣，而是春秋时代

^① 为了叙述的简洁，本书间或沿用儒、道、墨、法等学派名称，但这并不是返回到现有的学派区分，论述方向仍是集中于先秦诸子音乐话语的解构与重构。

^② 《乐记·乐施》：“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

在各国诸侯摸索新秩序的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现象。公元前 562 年，郑简公献给晋悼侯多名乐师、各种乐器以及女乐。晋悼侯把其乐队之一半下赐武将魏绛^①，这并不是偶然的。前一年即公元前 563 年，宋平公以《桑林》即前代王朝的天子之乐接待晋悼侯。^② 雄心勃勃的君主以护养宫廷乐团来炫耀国家力量的景象在战国时代延续。

由于各国乐团的规模化和所引发的各种负面作用，先秦思想家不得不重新反思音乐的本质和社会功能。按《左传》及《国语》的记载，各国政治家、乐师，甚至于医家等不少人都对当时音乐的发展方向表示忧虑。各国新音乐的发展引起人们的警惕，表现为种种警告性言辞，有人以礼乐规范为准批评非礼的音乐演奏^③，有人（如师旷）预见新音乐的享受将削弱国力^④。作为新音乐对立面的“先王之乐”^⑤ 或“古乐”^⑥ 等概念也在这时期逐渐出现。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当时君主对新音乐的过度追求将破坏国家财源^⑦，沉溺于新音乐会损伤人的和平性情^⑧。如果说前者是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提出的批评的话，后者则是基于对音乐与人情之关系的认识提出的看法。

孔子的音乐论是在古今音乐开始对立，新音乐吸引天下人，将进一步取代传统音乐地位的变动时期中酝酿而成的。孔子虽然不是发觉新音乐的问题或者对它抱着批判意识的第一人，但却是通过对古乐的全面性研究，

^① 《左传》襄公十一年（前 562 年）：“郑人（郑简公）赂晋侯（晋悼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侯，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

^② 《左传》襄公十年（前 563 年）：“宋公（宋平公）享晋侯（晋悼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荀偃辞。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鲁有禘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③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 550 年）：“杞孝公卒，晋悼夫人丧之，平公不彻乐，非礼也。”

^④ 《国语·晋语八》：“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有关记载在《左传》昭公八年（前 534 年）也出现。

^⑤ 将“先王之乐”与新音乐（被称为“烦手淫声”）对立起来的最早用例是在秦国医和对晋平公的忠告中出现的（《左传》昭公元年）。另外，以后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也出现“先王之乐”与“世俗之乐”的对比。

^⑥ “古乐”常常与“新乐”相对而言，例如《乐记·魏文侯》。

^⑦ 《国语·周语下》（前 522 年）：“（周景王）将铸无射，而为之大林。单穆公曰：不可……伶州鸠……对曰……若夫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有关记载也出现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前 521 年）。

^⑧ 《左传》昭公元年（前 541 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

再认识其价值且奠定儒家音乐理论基础的第一人。^① 关于古今音乐之对立，孔子不像前辈那样以“烦手淫声”（前 541 年）、“新声”（前 534 年）等表现笼统地概括，而是指出“郑声”来与“雅乐”相对。^② 其实，孔子批判郑声的真正含义是有争议的。何谓郑声？是只在郑国地区流行的音乐，还是从郑国开始，而后广泛流行的音乐？那么只是起源于郑国的音乐才有问题，此外的新音乐都没有问题吗？后代儒家音乐论都以孔子言论为准，郑国被韩国灭亡（前 375 年）之后仍一直袭用郑声为不良音乐的代名词。

后来与卫国音乐结合的“郑卫之音”的称呼也出现^③，但是新音乐的流行绝不限于郑卫地区。魏文侯问古乐与新乐的差异的时候，子夏罗列当时在中原地区流行的郑、宋、卫、齐国的音乐，作为新乐上瘾对意志有不良影响的例证。^④ 子夏对古今之乐的区分抱持相当强硬的态度。他虽然不得不暂时沿用魏文侯提出的“新乐”的名称，但不肯把新兴音乐与传统音乐放在同一个层次。他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先严格地区分“乐”与“音”，进一步主张只有与道德结合的音乐才可称为“乐”^⑤，其他音乐即当时的新兴音乐不应该被称为“乐”，而应该改称为“溺音”^⑥。子夏的这种主张并不是毫无损益地叙述孔子音乐思想，而是在音乐理论方面揣摩及强化的结果。孔子只用“淫”字来批评郑声，批评的重点也是在于新兴音乐的过度发展已达到将颠覆雅乐地位的程度，而不是对所有新兴音乐进行全面性批判。但是子夏不只认为各国新音乐的音调本身有让人

^①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的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5 页，台北，学生书局，1992）

^② 《论语》里提到“郑声”有两处共三次而已。“郑声”字眼都是在与“雅乐”相比的语境中出现。《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③ 代表性例子如下，《乐记·魏文侯》：“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这里“郑卫之音”是与“新乐”一样被认同的。）《荀子·乐论》：“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乐记·乐本》：“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也有并列“郑”、“卫”的例子：“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凡古乐龙心，益乐龙指，皆教其人者也。”（刘钊：《郭店楚简校释》，90 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④ 参见《乐记·魏文侯》。

^⑤ 《乐记·魏文侯》：“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德音之谓乐。”

^⑥ 《乐记·魏文侯》：“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盲目上瘾的因素，而且把它们都归于让心志淫乱、沉溺、烦乱、傲慢的不道德的音乐^①，以这种对各国新音乐的批评作为立足点，进一步在表演内容、演奏方式、乐舞形式以及乐手与乐器编排等种种具体方面阐明新乐与古乐之间的区分^②。

孔子门下也有对古今音乐不同的想法。《乐记·师乙》记载子贡与乐师乙之对话。这里体现的看法虽然借用师乙之口表达，子贡只扮演讨论者的角色，但是作为一个乐师的见解，不只表现出对古今音乐的相当合理的主张，也具有突破通常认为的儒家典型立场的意义。子贡向师乙质疑说，他以为按个人的不同性情，应该用不同类型的歌曲来培养各自的品德，如果是的话，那么对他自己最适当的歌曲是什么？^③ 子贡的看法与不顾人之个性而褒古贬新的子夏的看法相比是有一定距离的。师乙的回答更是先进。师乙让宽柔、广疏、恭俭以及正直与廉谦等不同个性，与和它们相宜的歌曲即颂、大雅、小雅及风对应起来。^④ 唐代学者孔颖达认为，按从颂、大雅、小雅到风的层次，相宜的品德之间也有等差。^⑤ 但是文本中表达的原意似乎并不是各类歌曲之间的等差，而是说明因不同品德可以选择不同歌曲的道理。因为师乙进一步介绍商齐之音，说明适宜歌唱商齐之音的品德之后，强调不同人品需要不同歌曲的理由，就是唱歌让人直率地表现自己的品德。^⑥ 虽然师乙解释说商音与齐音来源于古代音乐，但商音及

^① 《乐记·魏文侯》：“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

^② 《乐记·魏文侯》：“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③ 《乐记·师乙》：“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

^④ 《乐记·师乙》：“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

^⑤ 孔颖达《礼记注疏》：“颂成功德泽弘厚，若性宽柔静正者，乃能包含，故宜歌颂也。……广大谓志意宏大而安静，疏达谓疏朗通达而诚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性广大疏达宜歌大雅，但广大而不宽，疏达而不柔，包容未尽，故不能歌颂。……性既恭俭好礼而守分，不能广大疏达，故宜歌小雅者也。……正直而不能包容，静退即不知机变，廉约自守，谦恭卑退，不能好礼自处，其德狭劣，故宜歌诸侯之风，未能听天子之雅矣。”（702页上左至下右，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五册《礼记》）

^⑥ 《乐记·师乙》：“肆直而慈爱（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按孙希旦，后面的“爱”是衍文。参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10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齐音之所以得其名，是由于当时宋国及齐国人的传承^①，其实属于新乐^②。他不但以其由来之深远拥护商齐之音，而且把商齐之音所能培养的品德与“勇”和“义”这些儒家的重要德目联系起来。他说，精通商音的人，事事能够发挥决断力；精通齐音的人，尽管对自己有利，也能够退让。^③他接着说，临事不迟疑、能下决断的品德是勇，见到利益却乐意为了公正退让的品德是义，如果没有歌曲的作用，谁可以培养这种品德？^④

《乐记·师乙》看待宋国与齐国音乐的立场与《乐记·魏文侯》显然是不同的。^⑤虽然师乙只是婉转地指出当时宋国及齐国音乐中可取的部分，但这却是古今音乐论争中的一个新观点。被后代儒家定型的古今乐之分以及对古乐的崇尚，一方面规定了儒家音乐论向国家仪式音乐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是让儒家音乐论失去其理论活力的负面因素。实际上在当时社会中，古乐逐渐失去其作用，新乐则深受各国君主的欢迎。^⑥如果对这一现实没有提供有效的建议或合理的根据，而只是坚持先王之乐，这种理论不会有足够的说服力。尤其音乐是顺时而展开所以难以定型的艺术形态，在礼乐崩溃的情况下，如果已不可能保存与周代乐舞一模一样的音乐形式，那么应该恢复或继承的是古乐的精神，而不是古乐的原貌。

新音乐造成的这场讨论中，“乐”这一词的指示对象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在春秋时代，新音乐还没被称为“乐”，而是被称为“新声”，“乐”的原意为周天子赏赐的周代宫廷音乐的称号或者其乐队及所用乐器。但是，随着新音乐的规模与形式继续发展，各诸侯国的宫廷音乐、在世俗流行的新种音乐也逐渐被以“乐”字称呼，例如“新乐”、“郑卫之乐”、“益乐”或“世俗之乐”等。^⑦尽管子夏主张当时新音乐不应该被称为“乐”，但也阻挡不了

^① 《乐记·师乙》：“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按郑玄，“商之遗声也”是衍文。参见（清）孙希旦：《礼记集解》，1037页。

^② 子夏把齐音与商音即宋音归类于新乐。参见《乐记·魏文侯》。

^③ 《乐记·师乙》：“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

^④ 《乐记·师乙》：“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

^⑤ 为什么传世本《乐记》的编辑者没有消解其矛盾，把看似互相冲突的两篇同时收入《乐记》？对《乐记》篇章的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见本书第三章。

^⑥ 《乐记·魏文侯》：“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孟子·梁惠王下》：“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⑦ “新乐”出现在《乐记·魏文侯》，“郑卫之乐”及“益乐”出现在《性自命出》，“世俗之乐”出现在《孟子·梁惠王下》。